

今日道德 策论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道德反思

王玲玲 著

长征出版社

今 日 道 德 策 论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道德反思

王玲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道德策论/王玲玲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3
ISBN 7 - 80015 - 849 - 7

I . 今... II . 王... III . 公民教育 : 社会公德教育
—中国 IV . D64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83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江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225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20.00 元

ISBN7 - 80015 - 849 - 7/G · 229

当前道德建设面临的 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代序)

许启贤

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单位,一般还是比较重视道德教育的,并且采取了各种方法,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后,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公民道德教育,特别是开展了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二十字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教育,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了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发展的主流。

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新旧政治、经济、道德等观念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撞击,加之西方不正确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一手硬、一手软”的方针不能认真落实,在道德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党风不正、政风不正。一些权利机关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贪污腐化、买官卖官、执法犯法、公款吃喝等等。另外一些地方社会风气不正,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旧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如卖淫、嫖娼、走私、赌博等又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一些人为了钱,见利忘义、

弄虚作假、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社会犯罪现象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等等。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将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正因为如此，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在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以德治国和道德建设。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也写了不少文章，呼吁社会重视道德问题。

王玲玲副教授的《今日道德策论》一书，对当前社会道德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另外，从各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对策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

当前，从实践上要认认真真加强道德建设，这是不用置疑的。同时，要从理论上解决道德领域一些根本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是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这里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是中心任务，围绕这个中心任务，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理论界一些学者已提出了一些好的看法。但是，对这一问题，目前有两种片面的思想倾向。一种倾向是，在一些人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中，只讲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道德”，不讲或很少讲“市场经济道德”。似乎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这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好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另一种倾向是，只讲“市场经济道德”，不讲或很少讲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道德”，似乎只要市场经济道德如功利原则、平等原则、竞争原则等建立起来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就自然而然建立起来了。这种把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如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同市场经济道德原则如功利原则、竞争原则等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思想倾向是不对的。

第二、如何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仅需要法律规范，同时也需要道德规范，即需要“法治”和“德治”，也需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可是，在某些人看来，认为提倡“德治”与“法治”相矛盾，提倡“德治”就是“人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中国历史上，自汉代以来，“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对维护社会稳定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但也有合理性一面。我们所说的提倡“社会主义德治”，是在批评继承、弘扬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优良成分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新道德为基本内容的“德治”。它是为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服务的，和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我们在强调“以德治国”和“德治”的同时，决不能过分夸大道德的社会作用，而只是要给道德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和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以应有的地位，使它与“法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第三、如何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中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优良的道德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我们一定要借鉴和利用中国数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资源。厚古薄今是不对的，但也不能数典忘祖、否定历史。现在有些人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开口闭口是西方如何如何，这是不对的。1995 年 3 月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常委提了一个提案，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

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并指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何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当然，在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同时，我们也要继承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革命传统道德。

当然，要正确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仅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从各方面进行艰苦细致地研究工作，决不是说说就可完成的。

2003年1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

（许启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

序

王国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轨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其中新旧道德观念的激烈碰撞，使当代中国出现了道德多元化的局面，也使中国的道德面貌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罕见的巨大变化。当前，拜金主义泛滥、腐败“久治不愈”、欺诈造假日盛、道德失衡无序、公德意识淡漠等等，已演化、积淀成为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而目前道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没有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确立科学的伦理框架和道德立法，故而至今我们还没能走出道德无序状态。

于是围绕着中国的道德究竟是“滑坡”还是“爬坡”的问题，演绎出关于中国道德现状的诸多争执。

然而，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停留在对中国的道德现状究竟是“好”还是“坏”的理论争论上，而是要尽快找出导致或影响当前道德巨变更深层的原因，并进而找出解决存在于市场经济中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对策，以便我们顺利度过因社会转轨而带来的道德无序的过渡阶段，提高我国的全民道德素质。使我们在破除旧道德的同时，建立一个与新世纪、新时代相适应的新道德，让伟大的中华民族以一个强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崭新道德风貌屹立于世界之林；使我们国家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实现精神文明；在成为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同时，成为一个讲诚信、讲公德、讲高尚道德的礼仪之邦。让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从中国感受到人类道德的无尽魅力。或许这正是本书的社会意义所在。

而从其学术意义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里，

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或道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加强新时期道德建设等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理论界热衷的话题,论文、论著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睿智的思考、精辟的分析和闪光的观点。然而,给人的总体感觉是缺乏系统,或过于片面、过于肤浅,或过于牵强、过于散乱。

而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陷,将以往过于散乱的论题集中到道德与经济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上来,并紧紧围绕着与这一轴心紧密相联的一系列问题,如腐败问题、公德问题、诚实守信等,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和深刻的研究、分析及阐述。

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一方面弥补了这些年来这方面讨论过于散乱的缺陷,且分析更深刻、逻辑性更强,阐述更完整、更系统;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理论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意义。如“传统伦理的整合功能模式”问题、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等。本书的应用价值则在于将重点放在了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对策研讨上,较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了如何进行今日中国的道德建设问题。因此,它对我国经济伦理这门新兴边缘学科的建设和研究,丰富经济伦理这门新学科的理论宝库,以及对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都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另外从形式上看,这本书无论从论题、分析、推论还是思想的深度来看,虽是一本纯学术的论著,但是本书的语言并不晦涩、枯燥、乏味和过于学究气,而是在较大篇幅和程度上采用了“杂文”的文笔。这使得这本书既有犀利敏锐的语言,又有强烈的文化意蕴、深刻的内涵寓意和对现实较为独到的解读,可读性强,且适合社会各层次的读者对象,并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同时由于书中所用的论据绝大多数都是近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所以时代感也较强,这就更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

2002年9月
(王国炎:江西师大教授、硕士生导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篇 综观争论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大讨论 (4)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时期,并引发了当今中国深刻而普遍的社会重组、社会评判标准的重新确认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久以习惯了的道德信念、善恶标准乃至伦理话语的方式都受到了挑战,有的被冲击或者被颠倒了,还有的被发展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呈现出空前错综复杂的状态。

在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革、伦理精神产生急剧蜕变的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问题便无法回避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二、如何看待这场大讨论 (8)

表面上是判断道德形势“好”或“坏”的争论,内在地蕴涵着新旧两种道德观的对话,蕴涵着深刻而复杂的关于传统和现代道德的不同理解,并都涉及到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对道德理论和道德现实的思考,都足以引发关于道德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全面讨论,其背后隐藏着道德思维的方法、道德语境的使用和道德领域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

三、正确认识我国的道德现状 (17)

其实,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问题,这是人类永远要

面对的难题。我们只是想要强调应该正确认识我国的道德现状,不要一说“糟”,就认为是整体大滑坡、一片黑暗、一无是处;而一说“好”,就认为是一片光明、毫无问题。

第二篇 原因探究

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和挑战 (24)

传统道德的基础是小农经济,挑战传统道德原本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这种冲击的来势之猛,是国人始料不及的,超出了国人心理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承受能力,因此它所带来的影响常以道德的无序状态表现出来。同时,也使社会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性,并在现实中冲击了占主导地位的合乎伦理理性的价值取向,进而导致了个体行为中道德的缺乏。

二、人文精神的匮乏 (27)

人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的,人的本能总是有兽的欲望存在,这就需要人用理性和自觉来战胜它、制约它,如果人性没有根植于渊源流长的人文精神的传统之中,形成足够的自觉力量,那么人变兽不过是一刹那的事。

三、传统伦理文化结构中整合功能的丧失 (36)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忠”、“孝”、“仁”、“义”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并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发挥着强有力和恒久的社会整合功能,并一直都在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当我们在经历了多次从上到下的“自觉革命”和政治运动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整合功能已基本丧失,而最后和最根本的摧毁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的“革命壮举”中。

此后,乘虚而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犹如雪上加霜,使得失去了文化整合的国人在毫无心理准备、毫无缓冲过程的前提下,从几千年的群体状态,突然间碎裂为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体。

四、传统血缘宗法关系的影响及忽视公德建设 (42)

中国传统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虽然构建了丰富多样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虽然也强调伦理意义上对人的尊重，但它所推崇的仅仅是由于血缘关系带来的对家长身份、家庭以及社会尊卑地位关系的尊重；而它所倡导的“公德”，也是建立在轻视个人权利和尊严基础上的。因此，其“公德”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缺少现代社会公德中所应该涵盖的反映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和公共生活秩序以及尊重个人权利等方面的内容。

很显然这是一个公共生活空间先天发育不良的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的经济结构阻碍了人们公德意识和公德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它是当代国人公德意识淡漠的社会历史根源。

五、道德信仰的危机和道德意识的缺失 (49)

“文化大革命”——一个悲剧性时代的悲剧性结局，让最直接、最真切地参与和感受了这个时代的一代人的灵魂，在理想的破灭中承受着破灭理想的痛楚与煎熬，这也使“文革”的参与者成了20世纪最具荒诞色彩和悲剧色彩的一代人。他们以“革命者”的名义，“革”了文化和人性的命，为了制止一场虚构的“千万人头将落地”的“白色恐怖”，去拼杀、去献身、去犯这样那样毫无人性令人发指的错误。但最终它们又被自己所信仰的理想，并“誓死捍卫”的“革命”深刻而彻底地出卖了，成为了这场“革命”的牺牲品；成为了“崇高理想”的殉葬品。

当历史走到这里，当人格、尊严、理想被所谓的“革命”耍弄够了之后，谁还能相信什么？谁还敢相信什么？此时，权威的失落和道德信仰的危机便是无法避免的必然产物了。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道德怀疑主义，此情结的扩展便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便是“痞子”的应运而生。因为什么都不信者，是什么都敢做的。

六、社会道德控制机制的弱化 (65)

在社会处于经济转型的初期，社会道德的控制机制却正在弱化。

道德控制机制的弱化，虽然使人们从过去假神圣、伪崇高的“左”记道德中解脱了出来，但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犹如泼脏水连孩子一起泼掉一样，我们在摈弃“左”的理念时，把理性的道德精神也一块抛掉了，这就难免产生失重感、茫然感和虚无感。非理性的道德文化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认知极端跳跃的心理表现。

七、道德教育的迟滞低效甚至扭曲变形 (72)

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分析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义务为附近群众修理锅碗瓢盆，于是在他的面前排起了几十个人的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破损待修的器具。“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大家为别人做好事，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拣便宜的人。过去人们以为普及为别人做好事就可以改进社会风气，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专门拣别人便宜的人，将数十倍于为别人做好事的人。”这是道德教育被扭曲变形后出现的问题。

八、改革不彻底，市场经济还不成熟 (77)

当我们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际，没有及时地制定出配套的市场规则，尤其是没有首先制定出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这就给不正当利益的获得留下了太多的可能。现实中，由于权力太多地渗透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使它常常表现为一种“权力经济”或“人情经济”。并且已经在事实上造成了太多社会条件与机会不均等的特殊权力，使原本就客观存在着的贫富差距又人为的拉得更大了。

九、企业自身的道德局限 (88)

在今天的大众消费社会中，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并不只是产品质量和企业责任问题，而是企业的一种反社会行为。随着企业经营自由度的越来越大，企业的不道德行为还会防碍社会的公正。

十、行为主体(个体)的道德局限 (92)

市场经济的主体性特点，给了人们充分的自主权。行为个体完全

是凭着良知良能来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然而，单纯道德的约束常常是软弱的，没有法律的强制力量，仅靠道德舆论的谴责，无力惩罚道德素质低下、泯灭了人性的不仁不义之徒。于是“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示范效应，在利欲熏心、意志薄弱者那里获得了市场。

十一、权力的异化 (97)

权力 在本质上原本是**权利** 的派生物。即**享受权利** 的人将**行事的权力** 委托给另一部分人负责，于是被委托负责**权力** 的人便成了**权力** 的掌握者。显然，合乎逻辑的推论应该是：**权力** 的掌握者原本应当服从于**权利** 的享受者，接受享受**权利** 者的支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掌握**权力** 的人只是公仆，享受**权利** 的人应当是主人；**权利** 是原本的，而**权力** 是派生的。也因此，虽然**权力** 在它服务的范围内具有支配作用，但它的力度和限度都应该是由**权利** 决定的，同时也应当由**权利** 来监督并衡量**权力** 的运作。

然而现实中，**权力** 的支配作用常常掩盖了事实上应有的主仆关系，也使**权力** 的性质发生了异化——由“仆人”异化为“主人”；由“服务”异化为“主宰”。并进而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掌握**权力** 者可以决定享受**权利** 者的命运。

第三篇 对策研讨

之——针对转型期的挑战、冲击以及价值观多样化的态势 (109)

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价值系统是将一个社会凝结为整体的粘合剂。它赋予个人行为收敛性，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一旦缺失这样的系统，极端的一己私利便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社会便失去了凝聚力。

(一)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原则 (111)

(二)坚持集体主义的主导价值取向 (117)

之二——针对人文精神的失落 (125)

寻求现时代的人文精神，重建道德的精神家园，不能停留在“物”的

实在上,必须重视道德的形而上。因为对个体而言,若舍弃道德形而上,必不能成就大学问或高境界;对民族而言,若舍弃道德形而上,就会“像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黑格尔语)。只有站在道德形而上的高度,去掉一切偏执偏颇来透视现实的生命和存在,才有可能达到尽真尽善尽美的境界。

(一)构建新时期道德的人文精神——主体性意识 (128)

(二)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中吸取人文精神的精华 (129)

之三——针对传统伦理“整合”功能的丧失 (131)

1988年1月世界75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学者把孔子思想提升到拯救人类生存危机的高度来认识,虽然有过分夸张之片面性,但从此却也表明人类的发展既需要有取之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也需要有索之于东方的人伦精神,应该将两者合而为一。同时还表明,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确实可以作为加速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和精神资源。

(一)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 (132)

(二)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构建新时期的伦理整合模式 (133)

之四——针对社会道德控制机制的弱化 (139)

爱尔维修说:“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因为影响个体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体对其行为后果的赏罚——收益与代价的分析和预期。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富人乐善好施,固然与基督教的“原罪”文化有关,但是这些国家完善的法治环境特别是税收制度的制约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遗产税制度,捐赠慈善事业可以免税,而留下遗产则将课以重税。于是,在有些富人看来,让取之于社会的财富回归于社会,完成个人的道德升华或图个青史留名,比留遗产更有价值。

“他山之石”对我们的启示是:通过完善法治强化道德控制机制,让人从“经济”的角度感到“行善”的所得要高于成本,从而采取合乎理性

的道德选择。	
(一)加强法制建设	(139)
(二)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145)
之五——针对道德教育的滞后、扭曲、变形	(150)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教育组织和世界各国及地区越来越重视道德教育问题,表现出对道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在各国教育改革的讨论中,道德教育始终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在第 40 届国际教育大会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都强调要对学生加强道德、伦理、纪律和价值观的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组织研究的一系列科研成果,也一直把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一)更新道德教育的观念和内容	(152)
(二)切实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完成道德教育的转化	(153)
(三)加强道德实践能力的教育和培养	(155)
之六——针对公德观念淡漠、道德意识缺失	(166)
良好的社会风尚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道德状况如何,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无疑,注重社会公德建设,实际上也是在进行一项长远经济建设的投资。	
(一)明确公德的行为规范	(168)
(二)培养社会成员的平等意识	(169)
(三)培养尊重他人、尊重权利和公共生活规则的道德态度	(174)
(四)注重公德意识的培养	(175)
(五)建立鼓励公德行为的良性机制	(178)
之七——针对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不完善	(179)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行政权力过多

地渗透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然而我们在进行“放权”和“让权”的改革时，相关的“游戏”规则既不确定又没到位，反而使原有的一些行政部门因此而拥有了行政配置资源和市场经营的双重权力。结果，他们处于摆脱了权力束缚却仍享有保护获得私利的优越地位，享受着“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特权。

针对此，必须要有相应的“法治”和游戏规则，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既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和无节制的渗透，又约束“经济人”的行为，还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

- (一)加强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 (179)
- (二)发挥市场的作用，还市场经济本来面目 (181)
- (三)规范游戏规则，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 (184)

之八——针对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的道德局限 (188)

经济伦理并不是一种道德说教，也不是拔高了的道德理想，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特殊经济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无论是就宏观的社会而言，还是就中观的企业而言，伦理确实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对社会它可以促进一个社会的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企业它则可以促进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因此，我们既要注重一个社会的道德制度建设，也要注重一个企业的伦理文化建设。

- (一)重视企业伦理文化建设 (188)
- (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197)

之九——针对权力的异化 (202)

社会权力在其产生之初，总是源于社会公共管理需要的，少数掌权者手中的权力是由大多数享受权利的民众授予的。这意味着“权力”最基本和首要的特征应该是其服务性和社会性，这就决定了“权力”原本姓“公”。掌权者用“权力”为公众服务和谋利益，是“权力”最本质的性能，也是掌权者的本份。

然而曾几何时，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异化，当权力的职能发生了扭曲之后，作为粘贴在人类社会组织中的附生物，权力具有了鲜明的二重